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收效应研究

——以广西40个县为例

温玉卓¹, 刘楠²

(1.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桂林 541001; 2.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 桂林 541004)

摘要:农村普惠金融对改善农村地区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并以广西40个县为例,对其在2013—2017年的普惠金融发展进行测度及聚类分析。在聚类结果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增收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对收入层次较低的农村居民而言,普惠金融发展不利于收入的提高。鉴于此,本文建议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环境,推动不同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切实增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

关键词:农村普惠金融;居民收入;增收效应;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1)04—0094—07

一、引言

农村普惠金融在我国发展迅速,并致力于为广大贫困地区和人群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各级政府也多次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作为重要议题。广西作为欠发达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高,贫困地区点多面广。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改善广西农村地区经济并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供重要契机。近些年广西金融资产总量持续上升,金融市场格局也在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网点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社会保险覆盖率不断提升,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农村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结果。但是随着广西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一些新问题,如农村金融服务机构通常会因为还款能力存在风险等问题,将低收入层次的农村居民排除在金融服务对象之外。广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处于滞后状态,如何提高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大多是从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低收入层次家庭资金周转的角度进行的。Burgess et al(2005)以印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出增加印度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机构数量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提高。Mahjabeen(2008)以孟加拉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机构的建立,使得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状况得到了改善。Beck和Augusto(2010)基于2002—2003年世界各国的普惠金融调查数据,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算。Arora(2010)则基于Beck测算方法,从金融服务成本、便利程度及服务范围3个维度测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分析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Bauchet et al(2011)运用了随机评估的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村居民的家庭状况及个体状况的改善都具有积极作用,如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国内的研究中,田霖(2012)通过构建农村普惠金融的包容性评价系统,对我国各省份农村金融包容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王婧和胡国晖(2013)运用变异系数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使用成本和服务范围赋予不同权重,测算了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马九杰和沈杰(2010)认为推进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创新可以有效减弱金融排斥程度,同时能带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并对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具有重要作

收稿日期:2020—05—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从单一价值链到复合价值链:区域协调的机制创新与模式构建研究”(16BJL034);广西人文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科学研究工程专项项目“珠江-西江经济带实施普惠农村金融改革的模式与路径”(ZX2017006)

作者简介:温玉卓,硕士,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金融;(通讯作者)刘楠,博士,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互联网金融、宏观经济。

用。王曙光和王东宾(2011)调查了我国11个省的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状况,认为农村地区金融制度改革是当前农村地区发展的主要任务,而大力推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关键。董晓林和朱敏杰(2016)指出,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提供无抵押贷款等普惠型金融服务,可以提升农村居民自身扶贫的能力。推进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闲散资金利用效率,更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三、普惠金融的指标测度与聚类分析

(一)普惠金融的指标测度体系

本文首先选取了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使用度2个维度下的6个指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体系(表1)。由于广西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网点。因此本文选取银行网点数/每百平方千米、银行网点数/万人,来衡量普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金融服务使用度方面,选取银行各项存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体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存贷款比重,同时融入对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贷款的度量指标。

根据各维度的重要程度,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综合计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表2)。需要指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是相对值而非绝对值。因此,表2中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值,不代表相应地区普惠金融真实发展状况,而是地区之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对水平(吴迪,2017)。

从图1可以看出,2013—2017年间,部分县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得到显著提高,如大化县、平果县、罗城县等,但也存在相当比例的县区呈现普惠金融发展程度降低的现象,如平乐县、田东县等。从这一现象看,各县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需要进一步考虑区域差异,对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进行分析。

表1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

维度指标	详细指标	权重
服务可获得性	银行网点数/万人	0.208
	银行网点数/百平方千米	0.185
服务使用度	存款总额/GDP	0.206
	贷款总额/GDP	0.192
	农村居民贷款/贷款总额	0.217
	小微企业贷款/贷款总额	0.209

表2 2013—2017年广西40县农村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结果

地区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地区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巴马县	0.41	0.38	0.3	0.34	0.26	那坡县	0.33	0.15	0.61	0.53	0.52
大化县	0.4	0.32	0.59	0.45	0.74	南丹县	0.35	0.9	0.79	0.9	0.63
大新县	0.42	0.4	0.47	0.59	0.57	宁明县	0.48	0.3	0.3	0.13	0.07
德保县	0.46	0.31	0.58	0.61	0.61	平果县	0.25	0.07	0.48	0.55	0.82
东兰县	0.67	0.35	0.63	0.7	0.39	平乐县	0.7	0.08	0.16	0.21	0.35
都安县	0.61	0.69	0.53	0.56	0.76	平南县	0.16	0.03	0.3	0.13	0.66
凤山县	0.62	0.63	0.69	0.77	0.46	全州县	0.29	0.25	0.3	0.28	0.5
扶绥县	0.33	0.2	0.56	0.49	0.41	上思县	0.2	0.13	0.24	0.21	0.52
灌阳县	0.19	0.05	0.13	0.11	0.06	天等县	0.18	0.29	0.25	0.45	0.24
合浦县	0.33	0.45	0.57	0.7	0.4	天峨县	0.62	0.67	0.79	0.81	0.78
环江县	0.69	0.63	0.81	0.6	0.51	田东县	0.77	0.44	0.54	0.22	0.22
靖西县	0.34	0.21	0.36	0.34	0.39	田林县	0.43	0.45	0.45	0.49	0.49
乐业县	0.34	0.2	0.44	0.52	0.42	田阳县	0.39	0.6	0.3	0.39	0.69
荔浦县	0.18	0.02	0.07	0.2	0.22	西林县	0.4	0.35	0.54	0.69	0.45
临桂县	0.25	0.24	0.24	0.24	0.24	兴安县	0.18	0.29	0.25	0.45	0.24
灵川县	0.33	0.29	0.22	0.19	0.2	阳朔县	0.28	0.14	0.38	0.38	0.25
凌云县	0.3	0.14	0.55	0.57	0.47	永福县	0.31	0.32	0.23	0.16	0.41
龙胜县	0.32	0.18	0.44	0.24	0.25	昭平县	0.8	0.99	0.86	1	0.73
龙州县	0.39	0.34	0.47	0.44	0.09	钟山县	0.77	0.86	0.94	0.97	0.89
罗城县	0.76	0.93	0.43	0.39	0.99	资源县	0.39	0.34	0.47	0.44	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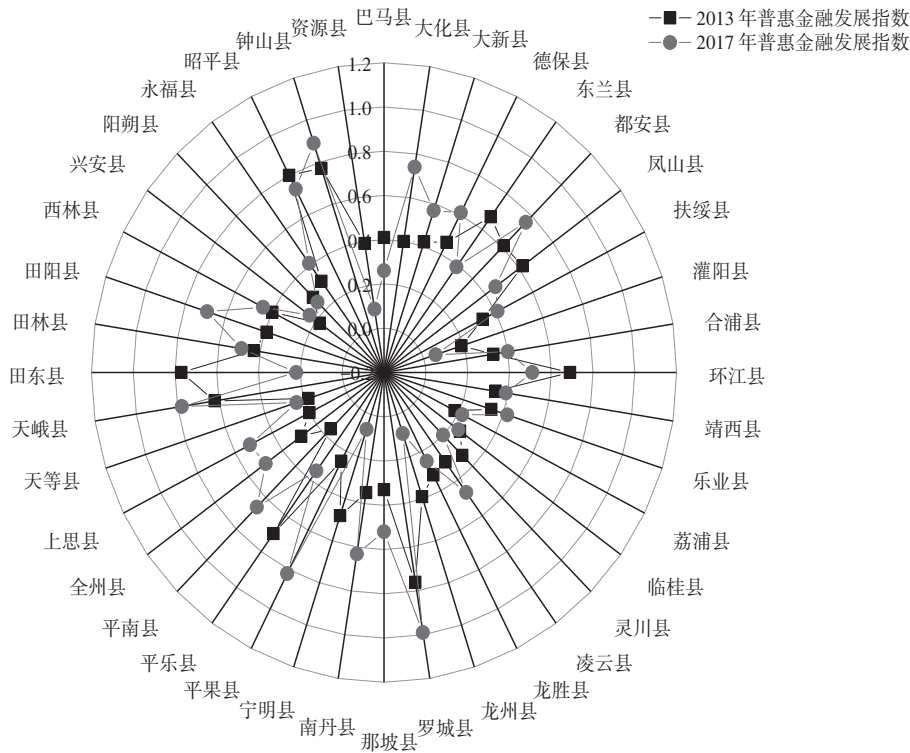


图 1 广西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比较

(二)普惠金融的聚类分析

本文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角度出发,借鉴朱建平和陈民垦(2007)的研究方法对广西 40 个县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标准选择的是广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单指标,采用离差平方和法和欧式距离(朱建平和陈民垦,2007)。结合广西各县地理位置特征,聚类范围设定为 3 组较为合适,聚类结果见表 3。

表 3 聚类结果

分类	地区	地区特征
第 I 类	钟山县、昭平县、天峨县、南丹县、罗城县、环江县、凤山县、都安县、东兰县、德保县、大化县	经济综合实力相对较强,人口密度大,依赖于资源优势,得到迅速发展
第 II 类	大新县、合浦县、西林县、田阳县、田林县、田东县、平果县、那坡县、凌云县、扶绥县、乐业县、龙州县、资源县、巴马县、靖西县	经济发展程度中等,包括能源主导型地区,部分县通过大量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居民增收致富
第 III 类	全州县、平乐县、龙胜县、永福县、阳朔县、兴安县、天等县、上思县、平南县、宁明县、灵川县、临桂县、荔浦县、灌阳县	集中于偏远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农业为主导的地区居多

第 I 类代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农村普惠金融水平 (IFI) 平均值在 0.50 以上,包括钟山县、昭平县等 11 个县。由于拥有资源优势,这些县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较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都优于他两类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值相对最高。

第 II 类代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等程度的地区,IFI 平均值介于 0.33~0.49,包括大新县、合浦县等 15 个县。这些县通过大量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居民增收致富,金融产业也相应地发展较好。

第 III 类代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IFI 平均值低于 0.32,包括全州县、平乐县等 14 个县。这类地区集中于偏远农村地区,人口分布普遍呈现“大分散、少集中”的格局,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均相对较低。

四、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广西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农村普惠金融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同时将产业结构、

就业率和财政支出水平设为控制变量,构建以下的回归方程:

$$INC_{it} = \alpha + \beta \times IFI_{it} + \gamma \times Z_{it} + \mu_i + u_{it} \quad (1)$$

其中: i 表示县区; t 表示时间; α 表示方程的截距项; β 表示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Z_{it} 表示相关的控制变量,即 $Z_{it} = [IND_{it}, EMP_{it}, EXP_{it}]$; $\gamma = [\gamma_1, \gamma_2, \gamma_3]$ 分别表示控制变量中的产业结构、就业率、财政支出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μ_i 表示回归模型中的个体效应变量。本文采取相关指标来衡量选取的变量,见表4。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Wind金融数据库及各县政府官方网站,对于极个别县某些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样本的平均值进行替代。表5列出了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二)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面板回归分析

广西农村经济存在明显的地区非均衡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状况也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本文根据前文的聚类分析将样本分为三组进行面板回归,分析每个类别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比较各变量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差异。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检验数据平稳性,以确定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由表6中的ADF单位根检验(augment Dickey-Fuller test)结果可知,各变量数据均平稳序列。

表7为豪斯曼检验结果,3个地区的样本均拒绝原假设。因此需要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蔡洋萍,2015)。第I类、第II类和第III类地区模型参数估计值见表8。

表4 变量代号及计算公式表

变量	变量名称	含义及计算公式
INC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IFI	农村普惠金融水平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IND	产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生产总值
EMP	就业率	全社会就业人员/人口总数
EXP	财政支出水平	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比重: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生产总值

表5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统计指标	INC	IFI	IND	EMP	EXP
平均值	0.7020	0.1495	0.7629	0.5188	0.1943
中位数	0.6388	0.1381	0.7805	0.5027	0.1784
最大值	2.2708	0.3790	0.9589	1.0128	0.4638
最小值	0.1875	0.0819	0.4195	0.2460	0.0540
标准差	0.3524	0.0447	0.1117	0.1092	0.0819

表6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第I类地区	第II类地区	第III类地区
INC	-9.77383***	-6.51811**	-6.6566***
IFI	-4.23778**	-11.8743***	-3.56194***
IND	-16.2729***	-13.375**	-6.29276**
EMP	-3.60601**	-1.45157***	-1.55706***
EXP	-12.9288***	-5.53269**	-5.63006**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表7 豪斯曼检验结果

指标	第I类地区	第II类地区	第III类地区
卡方	98.2390	21.2774	39.6672
P	0.0000	0.0012	0.0000
结论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表8 模型估计结果

第I类地区			第II类地区			第III类地区		
地区	截距	IFI系数	地区	截距	IFI系数	地区	截距	IFI系数
钟山县	1.207	1.043***	大新县	3.656	-0.334***	全州县	-4.304	0.468**
昭平县	0.365	0.417***	合浦县	-4.009	-0.444	平乐县	9.083	0.157***
天峨县	-0.449	0.376	西林县	3.772	0.196***	龙胜县	-3.477	0.049**
南丹县	-1.483	0.499**	田阳县	-2.365	0.465*	资源县	-3.26	0.138***
罗城县	-2.120	0.599***	田林县	3.251	0.831	永福县	-2.262	0.026*
环江县	0.228	-0.571	田东县	2.836	0.538***	阳朔县	0.143	-0.521***
凤山县	-1.079	0.496***	平果县	1.379	0.621**	兴安县	0.187	0.026
都安县	4.497	-0.896**	那坡县	-0.290	0.147***	天等县	0.590	0.155***
东兰县	6.294	0.911***	凌云县	3.321	0.814	上思县	-1.609	0.125**
德保县	-1.833	0.374**	扶绥县	3.102	0.958**	平南县	3.007	0.009**
大化县	2.212	0.643***	乐业县	2.182	0.07	宁明县	2.083	0.173***
—	—	—	龙州县	2.333	0.255*	灵川县	-0.953	0.261**
—	—	—	巴马县	5.013	0.364	临桂县	-0.477	0.287***
—	—	—	靖西县	5.614	0.246***	荔蒲县	1.059	-0.893
—	—	—	—	—	—	灌阳县	1.978	0.156***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由于各地区存在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差别,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路径变化呈现比较复杂的形态。从经济理论上说,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必然有显著影响。从实证结果来看,IFI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平均系数表现为第Ⅰ类地区>第Ⅱ类地区>第Ⅲ类地区。

在第Ⅰ类地区中,各农村地区截距项平均值为0.713,东兰县的截距最大为6.294;其次为都安县和大化县;罗城县的截距最小为-2.121。除了天峨县和环江县,其他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其中8个县具有正向效应,3个县具有负向效应。在第Ⅱ类地区中,各地区截距项的平均值为2.128,高于模型Ⅰ(0.713)和第Ⅲ类地区(0.119)。对于第Ⅱ类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中12个农村地区具有正效应,2个农村地区具有负效应,IFI系数平均值为0.338。田林县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最明显,表现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收入提高0.831%。对于田东县、平果县和田阳县等水平相近地区,它们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却对农村居民增收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这些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有待继续增强,以支持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力度(蔡洋萍,2015)。在第Ⅲ类地区中,各农村地区截距项平均值为0.119,灌阳县最高为1.978;全州县截距项最低为-4.304。其他地区截距项也较低,且大部分为负数。对于第Ⅲ类地区,除了兴安县以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均对第Ⅲ类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12个农村地区具有正效应,2个农村地区具有负效应,IFI系数平均值为0.041。综上,可以发现广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也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离不开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三)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不仅仅受到普惠金融差异的影响,还会受到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而这种差异往往体现在农村收入条件分布的差异。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法(Koenker,2006),可以针对农村收入的不同分位点估计出相应参数值,从而分析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在不同分位条件下形成的差异化的增收效应。

本文进一步针对农村居民不同收入层次,并根据聚类分析结果,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对第Ⅰ、Ⅱ、Ⅲ类地区分别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估计,进一步检验广西农村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及县域差异。根据式(1),可定义分位数回归模型为

$$Q_{INC}(\tau|IFI, Z) = \alpha + \beta \times IFI_{it} + \gamma \times Z_{it} + Q_u(\tau|IFI, Z) \quad (2)$$

其中: $Q_{INC}(\tau|IFI, Z)$ 表示在IFI和控制变量Z的条件下,INC的 τ 分位数。

对于式(2)的分位数模型,采用线性规划法估计其最小加权偏差,可以得出模型的相应参数的估计值,即

$$\min E[\rho_x(INC_{it} - \alpha - \beta \times IFI_{it} - \gamma \times Z_{it})] \quad (3)$$

其中: $\rho_x(\cdot)$ 表示分位数回归的损失函数,并求其期望值 $E[\rho_x(\cdot)]$ 。

通过求解式(3)的最小化问题,可得:

$$\hat{Q}_{INC}(\tau|IFI, Z) = \hat{\alpha} + \hat{\beta} \times IFI_{it} + \hat{\gamma} \times Z_{it} + \hat{Q}_u(\tau|IFI, Z) \quad (4)$$

基于上述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选取0.1、0.5和0.9的收入分位数水平,运用Stata15软件进行参数估计,表9、表10、表11分别给出了参数回归结果。

表9 第Ⅰ类地区模型估计结果

第Ⅰ类地区	估计值			标准误			P		
	q=0.1	q=0.5	q=0.9	q=0.1	q=0.5	q=0.9	q=0.1	q=0.5	q=0.9
IFI	-0.269	0.030	0.319	0.082	0.042	0.100	0.005	0.139	0.001
IND	-0.041	0.002	0.047	0.041	0.018	0.038	0.325	0.412	0.130
EMP	-0.070	0.040	0.155	0.180	0.099	0.212	0.346	0.159	0.271
EXP	1.317	0.323	-0.133	0.227	0.041	0.213	0.000	0.008	0.073

表10 第Ⅱ类地区模型估计结果

第Ⅱ类地区	估计值			标准误			P		
	q=0.1	q=0.5	q=0.9	q=0.1	q=0.5	q=0.9	q=0.1	q=0.5	q=0.9
IFI	-0.019	0.062	0.291	0.047	0.048	0.143	0.085	0.185	0.068
IND	0.053	0.078	0.106	0.089	0.020	0.126	0.313	0.000	0.438
EMP	-0.077	-0.058	-0.080	0.105	0.078	0.152	0.335	0.533	0.230
EXP	-0.023	0.017	0.082	0.060	0.126	0.073	0.498	0.373	0.311

表 11 第Ⅲ类地区模型估计结果

第Ⅲ类地区	估计值			标准误			P		
	q=0.1	q=0.5	q=0.9	q=0.1	q=0.5	q=0.9	q=0.1	q=0.5	q=0.9
IFI	-0.004	0.064	0.125	0.207	0.044	0.233	0.206	0.121	0.057
IND	0.019	0.026	-0.112	0.204	0.056	0.399	0.307	0.252	0.130
EMP	-2.002	-0.088	2.980	2.497	0.384	3.360	0.283	0.215	0.375
EXP	-0.184	0.151	0.323	0.503	0.232	0.811	0.212	0.156	0.073

由表(9)~表(11)可以看出,整体上广西各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分位点处,即对于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居民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随着分位点水平从0.1提高到0.9,农村普惠金融指数的收入弹性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高收入者的回报更高(李建伟等,2015)。

具体来看,对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第Ⅰ类地区,在农村居民收入的不同分位点上,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其作用方向并不完全一致,并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从低分位点(-0.019)到高分位点(0.291)经历了转负为正的变化。无论农村居民收入处于较低、中等或较高水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均较为显著。这类地区原本存在农业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广西早期农业基地恰恰是位于该区。农村居民收入受到资金投入不足,人力资源流失等因素的影响未能呈现较好的规模效应。因此在低分位点上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负反馈。在高分位点上,农村普惠金融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表现明显,加之该地区人力资源丰富进一步牵动了金融服务的聚集。因此第Ⅰ类地区影响度高于第Ⅱ、Ⅲ类地区并且呈上升趋势。

对于第Ⅱ类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变量表现出提升收入的效应。在农村居民收入的分位点上,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系数是正值,并且P小于显著性水平,这些地区表现为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贡献度高,说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伴随着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对稳定当地农业生产和保障农村居民增收均起到积极作用。农村普惠金融在此类地区借助产业优势最先得以发展,同时拉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因此,在此类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表现为影响程度逐步增加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也渐渐进入了农村居民收入的高分位点,在这些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也呈现出递增的趋势。

对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第Ⅲ类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同样表现出增收效应,具有一般的正向影响,受政策影响的时间所限,其影响效果并不明显。普惠金融发展对第Ⅲ类地区的影响度最弱,可能的原因是第Ⅲ类地区的人力资源规模和发展水平始终低于第Ⅰ类,由此产生的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牵动效应也最弱,进而导致第Ⅲ类地区人均金融服务获得率低,金融规模小且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罗斯丹等,2016)。因此,在第Ⅲ类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最小,且随分位点的增高逐步提高。此外,受特殊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有几个地区表现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无效的现象。

五、结束语

本文选取2013—2017年广西40个县的农村经济发展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聚类分析、面板回归分析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广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不均衡。同时,广西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有效需求不足,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第二,广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其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第三,广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处于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村居民影响不同,并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对于低收入农村居民,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其收入增长产生负向作用,而高收入群体则相反。基于此,本文给出如下建议:首先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高各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东部农村地区,各级政府和金融部门应该不断落实和完善金融服务的优惠措施,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资金及政策支持;其次,对于改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政策,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现状及自身特征,实行差异化的政策安排,加强各县之间的空间政策金融协作。

参考文献

- [1] 蔡洋洋, 2015. 湘鄂豫中部三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 42-49.
- [2] 蔡洋洋, 2015.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J]. 财经理论与实践(6): 31-37.
- [3] 董晓林, 朱敏杰, 2016. 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14-18.
- [4] 杜伟, 熊学萍, 石礼娟, 2011. 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 中国农村金融(1): 48-50.
- [5] 李建伟, 李树生, 胡斌, 2015. 具有普惠金融内涵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失衡调整——基于 VEC 模型的实证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1): 110-116.
- [6] 罗斯丹, 陈晓, 姚悦欣, 2016.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12): 84-93.
- [7] 马九杰, 沈杰, 2010. 中国农村金融排斥态势与金融普惠策略分析[J]. 农村金融研究(5): 5-10.
- [8] 田霖, 2012. 我国农村金融包容的区域差异与影响要素解析[J]. 金融理论与实践(11): 39-48.
- [9] 王婧, 胡国晖, 2013. 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 金融论坛(6): 31-36.
- [10] 王曙光, 王东宾, 2011. 双重二元金融结构、农户信贷需求与农村金融改革——基于 11 省 14 县市的田野调查[J]. 财贸经济(5): 38-44.
- [11] 王修华, 邱兆祥, 2010. 农村金融排斥: 现实困境与破解对策[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0): 47-52.
- [12] 吴迪, 2017. 内蒙古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研究[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 [13] 朱建平, 陈民恩, 2007. 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及其应用[J]. 统计研究, 24(4): 11-14.
- [14] BURGESS R, PANDE R, WONG G, 2005. Banking for the poor: Evidence from india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3(2-3): 268-278.
- [15] MAHJABEEN R, 2008. Poverty alleviation in bangladesh: Success story of grameen bank? [J]. Mémoire De Maîtris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2): 25-54.
- [16] BECK T, AUGUSTO D L T, 2010. The basic analytics of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J].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 Instruments, 16(2): 79-117.
- [17] BAUCHET J, MARSHALL C, STARITA L, et al, 2011. Latest findings from randomized evaluations of microfinance [J]. Language, 2: 1-27.
- [18] KOENKER R, XIAO Z, 2006. Quantile autoregression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1(475): 980-990.

Research on the Income Increase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in Guangxi: Taking 40 Counties in Guangxi as an Example

Wen Yuzhuo¹, Liu Nan²

(1.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Guilin 541001, Guangxi, China;

2. China Chemical Guilin Engineering Co., Ltd.,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Abstract: An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 measurement system is firstly constructed in rural in Guangxi. Then,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cluster analysis of 40 counties in Guangxi in 2013-2017 is operated, the increase effect of the income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tested.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in farmers' income levels in different regions, a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for further research. It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in Guangxi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growth, but farmers earned lower income,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has inhibited income growth. The results propos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ies by optimizing the rural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giving play to the government's policy guidance and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income-increasing effect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peasant income; income increase effect; quantile regression